

社会人类学智者费孝通

□ 丁元竹 江汛清

费孝通是一个社会人类学的智者。为什么费孝通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类学智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深入实地,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思考、分析,写出了在人类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的学术巨著《江村经济》,奠定了他在社会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江村经济》也是当代学人,不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经济学,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作为一个理论家,费孝通勤于思考、善于思辨,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他提出了至今为社会学界解释中国社会结构所采用的“差序格局”的基本理论,依然启迪当代学人从历史的视角去分析变迁中的中国城乡社会;作为一个思想家,费孝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一些关乎民族前途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思考,那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述,即描绘了人类和平共处的原则,也表达了自古至今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记得2013年参加北京大学系友会,一位北京大学领导在谈到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时说,“假如我们的学者能够提出这样的至理名言,并为学界各方面接受,并产生重大政策影响,那比100篇学术论文的意义要大得多”。眼下,国内各界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热烈地讨论、论证,甚

至争论。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民办智库纷纷为中国特色新型建设出谋划策,从理论到方法,力所能及,各尽所能。以致有人说,中国智库的春天到来了。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智库的春天里,各类智库柳绿花红、百花争艳。只有心怀历史地担当,才能承载民族梦想。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行行重行行,为我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智库,需要一个个能够在团队精神凝聚下,围绕时代命题,担当历史责任、胸怀未来梦想,积极探索、深入讨论、引领时代,无愧于时代的智库。伟大的时代,也需要智者,需要那些能够面对现实、宁静致远、跨界思考、高瞻远瞩、弄潮当代、启迪未来的思想家,思想集大成者。

温故知新。2014年冬天,把费孝通先生的全集重新通读了一遍后有一个感觉,打从踏上社会学的征程,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作为智库,作为决策咨询的手段和作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就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大约跨越了80年。我们最早看到他写的一篇相关的文章是1933年写的《社会研究能有用吗?》,发表在当时的《天津益世报》上。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先生说“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

作者简介: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汛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医疗社会工作。

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有了可靠的研究,不能制定可行的政策以济世救民,甚至为敌所乘,是行政者的不能尽责。”研究者、学者的首要职责是科学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弄清事实,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事实制定政策。打从踏上社会学的征程,费孝通先生就思考社会学的政策价值问题。实际上,他是想在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环节,这是一个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费孝通先生在80年前就开始了社会政策的探索,尽管那时还没有社会政策这个概念。

社会学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100多年。100多年来,围绕着社会学的应用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人们一直在彷徨、思考、辩论和探索。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人将其称为“启蒙运动”。它始于1919年,完成于1927年。“五四运动解决了套在圣经贤传里的中国人,使大家知道读书的目的不是‘天子’的科学考试,而是为了求得各方面的知识,只有知识才能帮助我们各个人的生活,能帮助整个人类的生活。”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中间树起了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但这个运动从开始至1927年,它所做的大多是介绍西洋的东西,且“的确表面化”。正如胡绳先生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在介绍西方科学和文化的时候,是‘全盘受之态度’的,因为那时的厌旧心情激起了趋新的心情,而凡西洋的都新,所以凡西洋的都介绍。”这场文化运动“在实践上所启蒙的社会运动。在社会方面演出二七事变,在民族方面演出五卅运动,在政治方面演出国共联合战线,因此逐在中国历史上成了1927年的国民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新文化运动,更是一场巨大社会变革运动的先奏。

“全盘西化派”和“反全盘西化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各国的发展规律问题,即承认不承认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全盘西化”和“反全盘西化”的斗争打破了自“五四”运动

以来隐含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世界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模式,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学术上的三大论战则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已经开始从实际上研究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从社会学传入中国,中国学术界就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争论:西方文化、西方学术价值到中国来是全盘西化?还是西学中用?还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和如何利用西方学术的思想来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来探索中国的出路,是几代中国人和几代社会学家不断在思考,不断在探索的一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依然使一些人困惑,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其寓意深刻,任重道远。

在社会学领域,关于智库建设和社会学建设,现在和将来,大家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探索,甚至会有争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解中国近百年发展过程的就会很容易找到答案。20世纪7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受命恢复被停止了20年的中国社会学。恢复社会学初期,就遇到了是照搬西方社会学模式,还是从中国当时的问题出发发展社会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学恢复的初期,费孝通先生倡导和提出“建立迈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围绕着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争论和探索的。“探索中国社会的出路是中国人的共同要求”。恢复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先生不是简单从学科体系入手,而是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切入,紧紧抓住农村改革与发展、小城镇等问题,来推动社会学发展。

仔细品味《社会研究有用吗?》这篇文章,费孝通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需要我们在社会学建设和智库建设时去思考,决策咨询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弄清事实为主要任务的科学研究是没有价值取向的,要把事实搞清楚,必须坚持价值中立;决策研究有价值取向,但是,它需要利用科学的事实做出来。二是要理清短

期研究和长期学术积累的关系,学术的积淀对于我们敏感地抓住一些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非常重要。三是前沿研究和历史积淀的关系,一个研究有没有历史的厚重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治国理念讲得非常好,他说,要知道我们要走向哪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现在在哪里。没有历史感和现实感,都会迷失。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着科学研究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每一门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这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一个专家会把一个问题研究得很具体、很细致、很深刻,但是决策的时候一般不会是针对这样一个很具体细节去决策,需要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比如今天社会学界谈社会治理,社会管理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社会”是从日文来得,“治理”是从西方来的。“治理”这个概念最早是政治学的概念,不是社会学的概念,最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综合,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也反映了新的社会内容,当前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强调决策咨询的综合性就是基于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讲到,“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该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个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就是大家对同一个问题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比如同样是户籍制度的问题,既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也可以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认识,还可以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去分析。要推动社会学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智库建设,需要在实践当中检验,并且在实践当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学术研究有一个特点,很多学者在做学术研究,也作政策咨询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比较深。学术研究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一个假设,然后去验证一个假设,可以从西方的某一个理论里面借鉴一个东西,然后提出一个假设去验证。但是重大决策多是以问题为导向,这就要求

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把握研究的不同特点。

1979年以来,费孝通先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使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类型方法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特色的整体分析方法。尽管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方法中存在着某些困难,它仍辟出了人类探索多元文化和社会的一条新的途径。这种整体方法的特点在于:它以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为研究单位,按照文化和经济的类型将这个单位进行分解,在对不同类型的研究中达到对于整体一般特点和多样性的把握。多样性研究是这种整体分析的特色之一。费孝通先生自己也承认,他自恢复社会学以来的工作中心就是立足国内——“市场在国内”探索中国乡镇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是他这个时期奋斗的目标。整体方法是他在这个探索活动中逐步形成的。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继续在他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初期开垦的土地上行走和探索,行行重行行,但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在文化研究上,他从单个的社区走向人类共同体的思考和探索,在文化变异与社会变迁理论的基础上走到了文化自觉。在发展问题研究上,他从单个农村走向区域,乃至全国和世界,从最初探索解决中国人民的饥饿问题到小康之后人与人如何相处,反映了他的认识不断在深入,他也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艰难和曲折。

社会理论只有变成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时,才能被检验。理论在被确认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而实践对于理论的要求是:它必须在严格的方法指导下,经研究者在实地中不懈地努力形成,这里不存在学科界限,只有准确性和全面性。“理论只要说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有准确反映社会实际的理论才能说服千百万人民群众。

既然历史已经证明:社会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千百万人民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并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现实任务是

什么?显然,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明显杂乱现象是目前社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一门科学难道非要表面上的统一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吗?”

社会学的建设要进一步发展,除了借鉴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理论与方法,也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来的旧事物。费孝通先生说,“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使旧的转化为新的。”不是所有新的东西都是好的。有些旧的东西,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中国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1931年底,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罗伯特·帕克到燕京大学做演讲,帕克在燕大期间曾经讲道,中国是一个“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一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结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适合而一致的整体印象”。1988年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英国人类学家叫Edmund Leach,他说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在学术规范性上有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本民族的人研究本民族的问题,有悖于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费孝通先生后来从这个问题开始思考不同文化之间怎么容忍和相处问题,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怎么融合问题,最终在不断讨论、不断思考过程中,当然也包括跟国内外学者争论的过程中,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这就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既被学术界接受,也被决策界接受的思想,脍炙人口。这就是一个智者的作为和智者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

当我们考虑建设智库的时候,当我们在推动学科发展的时候,这两个东西是不可以分开的,

这两个东西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但是努力要找到一个中间环节。文化之间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同样,学科之间和专业之间也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也看到,那些在不同学科之间能够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学者,最容易成为那个学科或者那个领域的智者。智者不仅是知识的集聚,还是思想的基点,更是心态的升华。

《墨子·修身》中说道,“静而能后安,安而能后虑,虑而后能得”。这句话不仅对智者有意义,也同样适用于智库。智库和智者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患得患失,都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出对民族和人类有贡献的研究成果。

注释: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胡绳:《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日报》,创刊号,1937年5月15日。

钟离蒙:《中国文化问题论战》,《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钟离蒙:《中国文化问题论战》,《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费孝通:《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页。

费孝通:《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1991年4月14日与沈关宝谈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页。

雷蒙·布尔:《社会学方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07页。

派克社会学论文集1933年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社出版。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孙菲)